

烟台故事

中蚨顺势退“洋火”

宋世民

当今时代,生活中已难觅火柴的踪迹。很难想象,一组长约寸许的小火柴,在清道光年间,竟是西方国家进贡给道光帝的珍贵礼品。

清人孙玉璋在《异闻琐录》中有这样记述:“道光间,英所供杂物,多瑶巧好玩,中有自来火者(时指火柴),长仅盈寸,一端五彩洋药,擦自而火爆发。士大夫见之莫不惊奇,叹为鬼物。今各大商埠均有市者,唯索值奇昂,非豪商显宦无力求之耳。”清廷高官重臣惊奇之余,以使用“洋火”为荣,外商见有利可图,随即将贡品火柴作为商品,大量输入中国市场。从此,欧洲产火柴反客为主,以洋火名义,堂而皇之地介入中国民众生活。

其实若论及火柴问世的渊源,有史料记载,公元577年南北朝时期,有宫女将硫黄沾在小



民国时期生产的火柴

木棒上,借助火镰击打火石产生火花,将小木棒点燃。后来人们称这种能点火的小木棒为“引光奴”,待成为商品时,又更名为“火寸条”,可以说这已是早期火柴的雏形。只是由于没能引起历来漠视民间科技成果的封建王朝重视,才落得个自生自灭的下场。

直到千年后的1826年,欧洲发明并逐步完善了火柴的功

能,遂于1833年,在瑞典卡尔玛省的贝利亚城建立世界上第一家工业化火柴厂。

鸦片战争后,在中国沿海开放口岸中,烟台是欧洲产火柴的重要进口港。据关册对烟台港开放初期进口大宗洋货统计,仅1864年至1866年间,火柴数量分别为3008罗(罗为英文量词,1罗12打,1打12个)、5425罗、10345罗,3年增长2倍多。

针对欧洲洋火大举进入,许多民族企业家也不甘示弱,积极探索试制适合中国民情的国产火柴,改变洋火独占中国市场的尴尬局面。

1879年,广东省佛山市由华商创办的巧明火柴厂投产,国内华人开办的火柴厂相继投产。山东境内,济南、青岛、胶州、潍县等地也先后建起机制火柴厂。大量国内地产火柴以成本低廉的优势,逐片收复先前被进口火柴垄断的国内市场。毕竟火柴生产

技术并不太复杂,掌握火头配料成分后,其他工序相对简单。民族企业一旦突破技术壁垒,发展势如破竹,销路持续兴旺。

民国初年,烟台地域尚无一家火柴工厂,民众日常生活所用火柴均为海外进口或外埠输入,民间许多人仍在沿用古代火石、火镰取火方式。商人徐铮臣见机制火柴业进展迅猛,烟台又是一片有待开拓的处女地,便于1915年与王子超、姜醒夫、牟君山等人共同

投资,在当时市区西郊大海阳河下游西沿(时为广仁堂义地,乐善街附近)租地盖房,创建“胶东中蚨火柴公司”,并在安东(现丹东)辟设分厂,自制柴杆、柴盒木片等材料。

为保证产品质量,他派人去往天津高薪聘请技师,所用硝磺、赤磷等化工原料,从日本、德国进口。产品投放烟台市场后,深受消费者欢迎。一时间,中蚨公司生产的“青蚨”“马枪”“九星”各牌红头火柴,家喻户晓。

人王益寿接办,筹资5万银元,恢复火柴生产,企业也更名为“昌兴火柴公司”,员工300余名,其中三分之二是女工。公司年产6000大箱,所产“蜜蜂牌”火柴,几乎一半的产量在烟台本地销售,其余的销往临近地区。

作者注:感谢冷永超为本文提供资料、插图



烟台昌兴火柴商标

1915年,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提出“二十一条”后不久,其秘密条款内容见诸报端,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中国的领土、政治、军事及财政都置于日本控制的霸道行径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,反日情绪空前高涨,全国各地发起抵制日货与救国储金运动。这种弱国对强国的抗争手段,在火柴贸易领域也取得了一定效果。

甲午战争后,日本成为各国在烟台贸易的“暴发户”。对烟台输入的主要货物是棉纱、棉布、火柴等,由于日本火柴价格比欧洲产品便宜,原先输入数量处于绝对优势的欧洲火柴,不得不让位于日本火柴。由于受中国一波接一波抵制日货运动的影响,加之民族火柴企业蓬勃兴起,日本火柴在华销售量经过短期涨势后,出现大幅跌落。这种市场走势,无疑为胶东中蚨火柴公司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。

公司初创时,主要化工原料

硝磺、赤磷等购自日本,现要抵制日货,必须选定新来源。徐铮臣等人从长计议,首先着眼国内市场。若国产原料质量不影响火柴使用效果,从内地采购,会节省许多运费。经多方联系,终于在河南省找到一家硝磺产地。迫于当时国内不能生产赤磷,又将采购渠道由日本、德国转移到英国、美国。所用柴杆系安东分工厂及烟台地产杨树制造。经这番调整,不仅稳定了火柴原料进货渠道,也避免了因抵制日货对民族企业产生的负面影响。在消费者纷纷弃用日产火柴的烟台市场,出现了中蚨火柴一枝独秀的局面。为满足需求,火柴产量大幅提高,由原来年产几千大箱,增至约一万大箱(1箱2400盒),每大箱当时值银约二十四两,为公司带来丰厚利润。

正当中蚨火柴公司兴旺发达之际,1926年,厂房不慎失火,企业亏损倒闭。随后由商

往事如昨

小油灯

刘吉训

人的记忆如大浪淘沙,有些沙砾会沉淀到记忆最深处,譬如几十年来,我总忘不了那些小油灯。

1957年,我升入台子完小念书。那时,全国城乡尤其是农村,正轰轰烈烈开展扫盲运动。班主任老师一动员,我们班许多同学都报了名,在晚上去当扫盲班辅导老师。我去的那个扫盲班在鲁古埠村,离我家五里路,要过一条小河,还要走好一阵弯弯拐拐的小路,才走到一个农家大院子。

那里有一间专门腾出的大屋子,里面摆了些条几、八仙桌、长条凳,那就是扫盲班了。扫盲班没有讲台,老师放书本和粉笔的也是一张八仙桌,老师身后挂了一块小黑板。印象最深的便是那些油灯了:虽然一盏油灯并不算明亮,但一间大屋子里,东一盏,西一盏,点了十几盏油灯,煌煌一片,与屋外漆黑的夜色形成强烈的反差。尤其老师桌上点的是两盏油灯,更要明亮夺目一些。

讲课的只有一位女老师,仿佛姓陶,30多岁,一张很漂亮而略显苍白的脸,一句句清楚简捷的讲解,一声声有节奏有韵味的领读……一切都被油灯朦胧的光映衬着,有一种特别的神秘感。我们这群负责辅导的小老师——男同学女同学都有,就零零散散坐在上扫盲班的农民身边。女老师叫大家练习读写,我们的事情就来了:一个个字指着教他们读,一笔笔示范着教他们写。

我紧挨一位老大娘坐着,说是老大娘,想来也不过50多岁的样子,但已皱纹满脸,头发花白,后脑壳梳起一个“饼饼”。我就成了她固定的辅导老师。当时讲课的扫盲老师似乎也没有规定的课本,无非教些“人、手、口、马、牛、羊”和“工人、农民、解放军”“毛主席万岁”之类的单字、词语和简单的句子。老大娘听讲、练读、练写都很认真,学笔画简单的字也学得比较快,但是学写当时还是繁体的“馬”字就很恼火了。起初她一笔一笔地“画”,“画”出一个歪歪斜斜,像个字又像匹马的“馬”字,我看了差点“扑嗤”笑出声来,说:“没关系,我来教你写。”我就一笔一画像电影慢镜头一般地示范,示范了几次后,她说:“我知道怎样写了。”可是她一落笔,笔又不听使唤了,歪歪扭扭写成个很笑人的形状。我便叫她捏着笔杆,我用手包着她捏笔的手指,手把手一笔一笔地教,反反复复地教。她终于写成了几个像模像样的“馬”字。老大娘把那几个“馬”字拿起来左看右看,笑得瘪起嘴,脸上的皱纹像朵大菊花。我也笑了,当时也才十几岁吧,就第一次尝到当老师获得成功满足和甜蜜……

岁月悠悠,转眼间过去数十年了。现在想想,正是当年那些小油灯,点亮了我这支平凡的蜡烛,随后默默地燃烧了30多个春秋。